

转载需注明出处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3期

## 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之维

袁文彬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 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产。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 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 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辨正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 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语言哲学 辩证法

### 一、导 论

柏拉图在《克拉底鲁斯》(Cratylus)篇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与赫摩根尼关于名实论的论争([1], pp. 1—19), 从而掀开了心灵—语言—实在三维关系几千年不断演绎的历史大幕。其本质问题是语言和外在世界的关系问题, 即语言与外部世界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还是语言不过是系统内符号之间的互动运作产生意义的问题。近代语言学则嬗变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对垒。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浪漫主义不无关系, 强调个人对语言的运用, 即修辞重于逻辑/语法, 凸现人文主义而悬搁科学主义; 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则与理性主义剪不断、理还乱, 凸显逻辑/语法重于修辞, 重科学而轻人文。如何融合两种学派, 在更高的基础上形成辩证的统一, 便是马克思语言哲学关心的问题。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29) [①]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其语言观, 即人的创造、社会功能和价值属性, 将“对话”和“独白”对立; 前者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 后者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詹明信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为从整体上研究语言的最好的一般性导论([2], p. 1)。继《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之后, 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1972)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 试图突破结构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而寻求在更高层次上辩证地融合结构主义思想。其实, 对詹明信而言,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早就暗含着辩证思想, 在涉及到语言/言语问题时,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 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 又是言语的产物”([3], p. 19)。”无论是沃洛希诺夫还是詹明信都在社会实践层面对索绪尔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语言哲学思想提出了批判, 在批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的辩证法。结构主义强调语言是独立于个人言说的封闭、共时、平面的系统, 而后结构主义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消解了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语用学对语言的经典阐释是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为不同目的而使用语言, 一切语言都是使用中的语言, 语境决定意义, 从而或多或少打掉了科学主义认为的带有本质主义倾向的所谓稳定的意义观。意义是不稳定的, 如同德里达所言, 文本之外别无它物。语境决定意义, 社会语境也是其中之一。这等于说,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所认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语言不谋而合,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了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实际上,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也有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 比如说, 语言既然独立于言语, 那么, 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没有言语, 语言的运作如何可能? 皮之不存, 毛将附焉? 语言符号自我运作, 主体性被消解, 人被消解到哪里去了? 这些简单的追问都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无法解释解决的悖论。当然, 追问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话语, 很难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类型(type); 先验地追问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结构, 又不免无法涵盖历史长河中鲜活的个人话语之表述的特型(token), 这两种独白性话语都无法揭示语言性质的庐山真面目, 不能形成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所言的对话型话语之复调音乐, 而只能众声喧哗, 因此, 如何解决其内在的张力便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要解决的正是两个学派的两难困境。

## 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相关性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开山之作，那么，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则无异于其姊妹篇，它不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相关问题，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之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分析法用于广阔的文学/文化文本的解读，如对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剖析，开拓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又一崭新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语言作为上层建筑，它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相关性问题，哈尼斯（Zelling Harris）写道：

在经济大萧条年代即将告罄的美国，无论是对俄罗斯的钦佩还是为战争所作的准备都不能阻挡卡尔·马克思科学、社会思想的影响。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向我阐明，在研读《资本论》的过程中，留给他影响最深刻的是马克思处理社会行为和语言学之间的相似性（[2]，p.1）。

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写于20年代晚期，根本没有参考《资本论》。他在导言中公开宣称，迄今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涉及到语言哲学，作为特定知识领域的语言哲学问题还仍然处于前辩证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统治之下，根本无法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问题。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根本没有从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中获得直接的学理支撑，而是从洪堡特关于语言是人类创造行为这一概念中获取灵感，并将语言分析设定为“在言说者社会一言语互动中实现的连续的生成程序”（[2]，p.1）。他反对语言学家仅对形式和模式（forms and patterns）作描述性的分类，反对语言机械式的系统化。在语言科学研究中，肤浅的经验主义甚嚣尘上，语音学研究占据了比例不相称的半壁江山，为语言研究设定了基调，语言研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语言作为意义符号的真正本质。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语言学界的执牛耳者广为传阅的语言学经典著作便是奠定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之父地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语言（语言系统）/言语（言语活动/话语）二分向沃洛希诺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考察言语交流（verbal communication）的过程中，他对索绪尔从概念上将共时和历时割裂开来提出了质疑。对沃洛希诺夫而言，索绪尔学派的思想运动来源于莱布尼兹的普遍语法概念，特别是发轫于17、18世纪欧陆的笛卡儿主义和理性主义。沃洛希诺夫因此说：

从整体上讲，语言的约定俗成性、任意性理念是理性主义的典型体现；没有什么比将语言比作数学符号更为典型的了。具有数学头脑的理性主义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符号和它表征的现实世界或与作为现实创造者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业已被接受、被认可的封闭系统内符号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们只对符号系统本身的内在逻辑感兴趣，就像处理几何学那样，完全独立于赋予符号以内容的意义（[2]，p.58）。

对沃洛希诺夫而言，言语符号就是言语行为，言者和听者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语符号是最纯粹的社会交往媒介，符号研究因此是语言研究首要的问题。沃洛希诺夫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中的符号运作及其支配符号系统的规则。在众多的符号系统中，语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特征。言语行为作为言语互动的分析不仅可以解蔽人类心理秘密，而且可以解释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心理学”的复杂现象，对马克思认为的物质基础和人类心智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做出有效的诠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如果从真正的言语互动程序中脱离开来，就可能滑入“集体精神”、“集体内在心理”抑或“人类精神”之类的形而上学或神秘主义概念之中。简言之，言语行为及其支配系统的规则是人类行为占统治地位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框架系统中被赋予了首当其冲的地位。符号科学可以追本溯源到古代哲学，它们赋予了奥古斯丁以灵感，在中世纪则向经院哲学提出了挑战，业已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沃洛希诺夫看来，语言哲学就是符号哲学，在众多的符号系统中，在话语中实现的言语符号最能显示符号研究的对象。在具体的话语中，个人对社会符号的操作是由社会关系来调节的，社会语境决定了话语结构。对话是言语交际中相互关系的基本模式，是社会创造性活动。因此，沃洛希诺夫把符号作为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从而展开了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涉及到两个基本派别。第一个派别是语言科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第二个派别则是抽象客观主义。第一个派别把个人创作行为看成是语言的基础，属于意识形态之列，其代表人物是洪堡特；第二个派别则把语言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客体，独立于其言说者，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列，其代表人物可追溯到笛卡儿。

沃洛希诺夫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设定了思想框架，詹明信则在此基础上深化了其批判思想。在詹明信看来，这两个思想流派是英美经验主义和欧陆先验语言学的对立，各有其得失，所以应将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整合，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冲出《语言的牢笼》，将语言模式置入到广阔的文学/文化语境中考察其带来的思想魅力。所以，其指导思想是“说明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的共时方法与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并描述这一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这些领域中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sup>[7]</sup>。历时和共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索绪尔却将这两者割裂开来。尽管索绪尔的理论中也含有历时模式、突变理论，能够对历史变化做出启发性的解释，但在根本上，却不能把历时和共时在一个系统中整合起来<sup>[8]</sup>。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局限性也在于此。詹明信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结构主义在俄国形式主义中的体现；俄国形式主义无法摆脱的困境。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性主要是形式问题，通过“陌生化”手段获得。俄国形式主义凸显的是形式，并将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结构主义也是如此，将形式转化为内容，强调事物的形式就是事物存在的理由这一亚里斯多德式的命题。所以，我们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建立真正的诠释学和符号学，以便真正地将形式与内容、符号与意旨活动结合起来，达到更高的辩证融合。

当然，作为文学/文化批评家，就像本雅明的本意不在于对语言作具体的分析，而在于文化批判一样，詹明信醉翁之意不在语言模式本身，而在乎语言模式本身给文学/文化批判提供的理论支撑。因此，詹明信后期的文本将语言模式用于晚期资本主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逻辑分析，显得顺理成章。因此，语言模式是詹明信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分析批判的武器，成为其批判的出发点。对詹明信而言，索绪尔的共时/历时模式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生产方式。一是将生产方式的发展看成是历史的系列，从原始部落的生产方式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再到

封建生产方式，直至资本主义，这是历时方式；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同样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即把每一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的共时系统来考察，这样在同一生产方式之内便有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下层建筑指的是生产力、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则包括所谓政治、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在内。当然，语言本身并非是中性的“零度写作”（zero degree writing），也充满了意识形态，语言本身当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换言之，社会存在决定语言，语言本身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即语言本身也具备对社会的构形力（shaping force）。这样，语言哲学问题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 三、两种流派

两种对立模式在中世纪体现为唯名论和唯实论，在启蒙时代则体现为英国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的对立，特别是洛克《人类理解论》和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更是揭开了两种流派旷日持久的论证，历史比较语言学 and 结构主义语言学则是其近代的注脚。索绪尔原来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学者，深感历史比较语言学无法揭示语言的性质问题，转而寻求语言的静态结构分析，悬搁历时，突显共时维度，从而掀开了现代语言学的序幕。这两种语言学流派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沃洛希诺夫把这两种语言哲学流派设定为语言科学中的个人的主观主义和抽象的客观主义。第一个流派的基本观点是：1、语言是一种活动，一个由个人言语实现的不间断的创作构造（energeia）过程；2、语言创作规律是个人心理体现；3、语言创作是有意义的创造，类似于创造性的艺术；4、语言作为现成的产物（ergon），作为稳定的语言体系（词汇、语法、语音），不妨说是死板的沉淀物，凝结了语言创作激情，是抽象地构造的语言学，以便在实际中把语言作为现成的工具来学习。第二个流派的基本观点是：1、语言是稳定不变的体系，由规则一致的语言形式构成，先于个人意识，并独立于个人意识而存在；2、语言规则是既定的封闭的语言系统中语言符号之间如何联系的规则。这些规则对于任何主观意识而言都是客观的；3、特定的语言联系与意识形态价值（艺术、认知及其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决定语言现象。在词语和它的意义之间没有自然和概念联系，也没有任何艺术联系（[2]，p. 57）。

第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奠基人是洪堡特，其思想的基本内核表现了第一个流派的基本倾向，在俄罗斯的代表人物则是A. A. 波捷布尼亚及其追随者。如果说第一个流派的基本观点是修辞重于逻辑/语法，那么第二个学派则认为逻辑/语法重于修辞，因而语言学是在认识论的轨道上运行的。第二个流派研究的是语音、语法、词汇作为语言形式的体系。对于第一个流派而言，语言是动态的个人言语，是言语行为流；对第二个流派而言，语言则是稳定不变的静态规则体系。个人言语行为流动不居，不可重复，不可捉摸，无从把玩，然而，在这种动态的言语流之互动中，都有一致的因素使得言语行为之表述成为可能，这就是语音、语法、词汇的规则体系为言语行为的理解提供了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语言体系作为无法违背的规则体系，完全独立于个人而存在，与个人相对立，个人只能接受。语言的规律性是内在的、封闭的共时体系，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或艺术规律，从而排除了作为个人语言发展的历史因素。语言的形式体系和语言的历史形成没有任何联系，语言共时范围内所探讨的问题在历时性范围内不再普遍有效，语言的静态结构和动态的历史演变互不通约（immensurability）。

对詹明信而言，思想史无异于范式的历史，经典力学、机械论、自然选择、原子核或电子场、计算机等概莫能外，都是系统化的模式，用于构架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并解释人类社会现实。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以C. K. Ogden & I. A. Richards (1923) 合著的《意义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和索绪尔（1916）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分别为其标志。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传统根植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肇始于欧陆理性主义传统。在语言学中，追求永恒的、变动不居的规则系统的结果是语言等同于逻辑，其表现形式则是语法。浪漫主义则用语文学代替了语法，其标志是历史发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格莱姆规则、葆朴的印欧语重建、日尔曼语文学的繁衍，最后在新语法学派那里达到高潮。索绪尔革命首当其冲地被理解为对新语法学派的反叛。新语法学派对语言的历史演变兴趣甚笃，力图重建原始语言，寻找语言间的亲缘关系，保罗的名言便是“语言学中非历史的便是非科学的。”与此针锋相对，索绪尔将历时和共时区分，将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区分，认为语言学中要有意义就必须是共时的，这同样是绝对、专横的价值判断。

这样，语言研究就从实体论走向了关系论，即库恩所言的范式转换。实体、事物都被价值和关系取代。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积极要素（positive terms）。换句话说，事物本身的性质不如它在系统中的功能重要。只有求助于非人格化的语言关系系统，才有可能揭示语言的本来面目。索绪尔的关系论不过是反实证主义的思想流派之一。系统关系论的提出是索绪尔有别于十九世纪晚期的宗教复兴、克罗齐的直觉说，是对语言学潮流中所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人文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反叛。索绪尔暗示了在这个世界中，形式就是内容，形式不仅指出了对象，而且还创造了对象。形式就是事物存在的理由。索绪尔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之转变，可以概括为形式化（formalization）的努力（[5]，p. 6）。

詹明信对索绪尔将共时和历时对立展开了批评。共时和历时之区分是索绪尔理论能够成立的唯一基础，但这一区分不顾历史，显然不符合辩证法，因为其基础是纯粹的对立，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调节。当然，占主导地位的对立是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对立，前者是语言潜在可能性的总和，后者则是个人话语，是潜在可能性的实现。Ogden和Richards对此进行了批评：

索绪尔也不停下来追问自己到底在找什么，也不想有什么理由非找到不可。相反，他走上了所有科学开始常走的道路：虚构实用的东西，名曰“语言”……但是，把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指导原则，那是不可思议的。再说，这种在可验证的范围之外虚构语言实体的做法也等于拆其符号理论的基石（[6]，pp. 4-5）。

詹明信认为，英美经验主义的劣根性就在于顽固地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凸显了英美经验主义根深蒂固的实体论立场。上面的引文也表明了Ogden&Richards对索绪尔理论真正不满的地方正是其辩证法思想。索绪尔提出这一对立是辩证的，指出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强调的是相互关系而不是实体，击中的正是经验主义的实体论要害。英美经验主义总是将对象彻底孤立起来加以研究，索绪尔开创的这种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对立正是一种

辩证法思想。语言虽然不能使我们见诸实物，但它提供了实物存在的可能性。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反映了有机体模式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在解决语言特定性质所提出的问题时不再普遍有效。这种新的对立形式肩负的任务就是将语言中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分门别类地加以归纳整理。言语，即个人话语对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而言无关紧要。但是，把言语和语言的关系看成事物中个别与整体的关系或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或物理现象和物理法则的关系，等于重新搬出新语法学派的模式，而索绪尔所要取代的正是新语法学派。索绪尔解决问题的方法聪明绝顶，用的是“话语回路”（circuit of discourse），即两个说话者的对话关系，“这就是索绪尔理论的独创性，他使说话者的言语从他的理解者的语言中分离出来，对理解者而言，说话中的言语是主动的方面，而语言是被动的方面，事实上，对理解者而言……语言与其说是说话的能力还不如说是理解的能力”（[4]，p.26）。于是，纯发音问题、地方口音、错误发音、个人风格等都从新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成为另一门研究言语的语言学，在此条件之下，仍然可以将对语言的研究具体化，因为可以通过言语使用者的理解范围和特殊方式来研究它。

在詹明信看来，结构主义语言学突破了古老的语言理论，即“亚当理论”[②]，认为词与物有着天然的联系，不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符号的任意性打破了天然语言的神话，同时又把语言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即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不仅因为人类有说话这一特殊技能或天赋，而是因为他有创造符号这一更全面的能力。对英美经验主义中的“symbol”一词，詹明信也给予了批判，因为该词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词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象征”这个词预示着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这就是何以Ogden和Richards总是要到象征系统外部去寻找象征所代表的事物的原因。而索绪尔及其结构主义语言学回避了语言符号与其现实对应物的关系问题。对詹明信而言，其含义不是语言符号表征着现实世界的问题，而是语言符号系统本身与现实处于等同的位置，换言之，语言整体就如同现实世界的结构一样，我们是从通过一个整体或格式塔完形到另一个格式塔完形来认识事物的，而无需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是形式而非物质，是事实的总和，不是事情的总和。实体论到关系论的转向切合了人文科学在当代的发展，为人文科学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通过对语言和言语的分析，詹明信拓展了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在詹明信看来，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几千年以来的语言学传统使得人们总是认为人是语言的中心，语言是人们使用的工具，这在英国经验主义者那里更是甚嚣尘上。人虽然是说话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并不控制着语言，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詹明信还提出了语言、心灵和现实之间关系的看法。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提出语言先于存在，不是存在决定语言而是语言决定存在。詹明信认为这和结构主义如出一辙，这种假设还带来语言的另一个问题即语言的起源问题：

关于语言的起源的研究，最终带来的只是谜或者神话，也可以说结构主义者对共时性的强调，正是源于对起源探索的失败。对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总是回答不了语言起源这个问题，只能引发一些形而上学的回答，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起源问题是个假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语言作为体系总是已经完成的，我们所有关于起源的研究只能带来神话……而萨皮尔-沃尔夫提出的假设，虽然不能证实，对文化研究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文化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语言形式上，再从语言形式推论出人们的思维方式（[6]，pp.135-136）。

因此，那种以为我们被语言所掌管，与其说我们在书写语言，毋宁说语言在书写我们的想象，不是对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彻底解脱，而是我们必须突破的限制或牢笼。

#### 四、两种模式的融合

如何融合两种语言哲学流派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亟需解决的问题。沃洛希诺夫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二者之间的对立；詹明信所要克服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和欧陆结构主义的二元分野。沃洛希诺夫和詹明信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融合两种流派的分歧。沃洛希诺夫用对话理论来突破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的对峙；而詹明信则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来融合英美经验主义和欧陆结构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

对沃洛希诺夫而言，个人主观主义是正题，抽象客观主义是反题。在对两种流派展开批判之后，沃洛希诺夫并没有采用折衷主义的方针来融合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之间的分野，他说：

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衷，而是在它们之外，超越它们，既是对正题又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2]，p.82）。

抽象客观主义是与唯理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观主义是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抽象客观主义认为语言作为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是一种抽象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只适合于破译和教授外来的死语言，在语言事实的生命和形成中，这一体系不可能成为理解和解释它们的基础。相反，它把我们活生生的语言形成的现实性及其社会功能中引开，尽管他们自诩其观点具有社会学意义。抽象客观主义不能正确提出理解历史的根据，因为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道的历史现象。抽象客观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认为语言体系是唯一重要的，排斥了言语行为作为个体的表述。虽然个人主观主义重视言语行为作为个体的表述，但是它忽视和不理解表述的社会属性，并试图把它作为说话者内心世界的表现，而把社会属性从内部排除出去。实际上，表述的形式也是社会的形式，语言现实所真正归入的表述言语流本身也是社会的语流，其中的每一滴都是社会的，其整个形成过程也是社会的。个人主观主义虽然不能把语言形式和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分割开来，但它是从个人心理的环境中引出词语的这种意识形态内容的。当然，和抽象客观主义一样，个人主观主义的最大错误在于其出发点是独白型话语：

语言-言语的真正现实不是语言形式的抽象体系，不是孤立的独白型表述，也不是它所实现的生物心理学行为，而是言语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是由表述及表述群来实现的（[2]，p.94）。

语言是活生生的，并且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而不是在抽象的语言形式体系和说话者的个人心理之中形成的。由此，沃洛希诺夫提出了其语言研究的方法：在与具体环境联系中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和类型；与相互作用密切相连的单个表述、单个言语行为的形式，它们是相互作用的成分，即由言语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生活和意识形态创作中的言语行为体裁；在一般语言学阐释中来重新看待语言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以言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作为其基础。无论是作为正题的个人主观主义还是作为反题的抽象客观主义都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与语言的真正属性是不相符的。在此基础上，沃洛希诺夫提出了其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1、语言作为固定的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仅仅是科学的抽象化，只有在一定的实践和理论目的中才有效，抽象化与语言的具体现实是不相符的；2、语言是由说话者的社会言语相互作用而不断形成的过程，即现代语言学所言的言语互动；3、语言形成的规律绝对不是个人心理的规律，但也不能脱离说话者个人，语言形成的规律是社会学的规律；4、语言创作是与艺术创作或任何其它的社会意识创作不相符的。然而，语言创作若脱离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和意义，就不能够被理解；5、表述结构是纯粹的社会结构（[2]，p.98）。沃洛希诺夫在批判两种语言学流派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社会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语言哲学研究应该跳出这两种流派的桎梏，寻求在对话中辩证地融合，正如巴赫金所言：

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7]，p.6）。

詹明信则在批判英美经验主义和欧陆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融合这两种语言哲学思想。詹明信以意识形态为框架在思辨的层次上对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辩证法的融合。詹明信认为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将语言学的最新发现引入哲学体系，是不可行的方案。因此，对结构主义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从另一头钻出来时才能在理论上得出令人满意的观点。索绪尔提出的语言/言语、共时/历时、能指/所指、组合/聚合所开创的二元对立，为人文学科提供了巨大的解放思想的力量。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摆脱英美经验主义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体论，强调关系论的思想方面掀起了语言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语言学恰恰是以没有实体为特点的科学，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无积极要素，这种强调关系而不强调实体的思想对詹明信而言是辩证的，因为语言系统内部的运作本身就能够产生意义，而无需像Ogden和Richards到语言外部去寻找指涉物。但是，索绪尔不能在同一个系统中辩证地融合共时/历时概念。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局限性也在于此。詹明信不是以语言学家的身份对结构主义展开批判，而是以一个当代文化批评家的身份对其展开的批判，其真正目的在于利用语言模式提供的契机，把它用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如对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诸如施特劳斯的神话学、人类学，阿尔杜塞和福柯的社会历史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巴特的符号学、格雷马斯的语义学等。因此，詹明信说道：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语言学家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注意的是指涉物，是各种索绪尔派的理论称之为对象的东西，而我们的兴趣则一直放在整个系统的同一性上，放在它作为其它思维方式的模式或比喻所能提供的启示上……而我们从现在开始则要研究这一原始理论在其它知识领域的情况，特别是它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这些领域中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9]，p.39）。

詹明信后来的作品将这种作为比喻的语言模式用于音乐、绘画、电影等众多文本的分析，开辟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批判的先河（[10]）。对詹明信而言，无论是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还是法国结构主义在结构上都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的理论体系。因此，就应冲破语言的牢笼，并寄希望于真正能将形式与内容、符号与意指活动紧密结合起来阐释学和符号学。

## 五、结束语：冲破“语言的牢笼”

从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到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再到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这一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承前启后的思想轨迹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地形图，对语言、心灵、实在三维关系的运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恩格斯突出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强调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而詹明信突出的是语言的辩证性，三者的共同之处是语言：不仅是语言内部的符号运转，而且它还与外部世界构成了互动的关系网络。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且还关注语言外部及其与语言同构的外部世界，这就有意无意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语言，社会意识/语言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巨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总是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变世界。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则是通过对与社会存在同构的语言进行批判，并把语言分析模式用于分析文学/文化文本，并进而拓展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从而通过对语言的批判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这既有理论上高屋建瓴之探讨，更有对当下的现实之关怀。从语言内部研究拓荒到广阔的文学文化语境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冲出“语言牢笼”的基本方式，为我们研究语言问题提供了迥然有别于仅作为语言学家的思路，从而开辟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崭新且别具一格的新航线。

（参考文献）

[1] HARRIS R. & TAYLOR J. T. *Landmarks in Linguistic Though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1-19.

[2] VOLOŠINO V. N. *Marxism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 1; 1;58;57;82;94;98.

[3] Saussure de Ferdinan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Trans. Wade Baskin. Peter Owen Limited. 1960.

[4] JAMESON F.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reface x; 21;26;39.

[5] BENVENISTE 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Coral Bable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6.

[6] OGDEN C. K. & RICHARDS I. A. *The Meaning of Meaning*[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A Harvest/HBJ Book. 1923/1989:4—5.

[7] 詹明信.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小兵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35—136.

[8] BAKHTIN M. *Problems of Dostoevsky' s Poetics*[M]. Trans. Caryl Emer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9] Jameson Fredric.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M].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0] JAMESON F.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责任编辑 胡新和)



Copyright 2001 - 2009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 邮编: 100190  
电话: (010)-57552555